

建国初期基层选举中的政治传播

——以江苏省首次普选为例

熊秋良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普选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主建政之举。在其政治传播过程中,组织传播保证了选举信息的畅通,会议传播加速了选举信息的扩散,媒介传播契合选举目标,口号传播濡化了民众的政治心理。为了彰显政权的人民性,党和政府始终以树立人民当家的思想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政治传播的价值取向,从而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关键词 基层选举 政治传播 江苏

熊秋良,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210093

1953-1954 年的全国首次普选 培育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增强了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与拥护,使新政权获得了巩固的合法性基础。然而以往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对普选过程及其政治动员的探讨,而较少涉及基层选举中的政治传播。事实上,政治传播也是考察这次普选的一个重要视角。在新中国首次基层选举中,党和各级选举委员会通过有组织、多渠道、多媒介的政治传播,引导、说服和教育民众树立主人翁精神,规范选举行为,俾圆满完成普选,以凸显新政权建设的人民民主性,体现了对于政治传播艺术的娴熟运用。本文将以新中国江苏省第一次基层选举为研究对象,解析基层选举过程中政治传播对中国当代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

一、“选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做代表” ——政治传播的目标

所谓政治传播,就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1]具体而言,“政治宣传(传播)即政府、政党、压力团体、大众团体等组织指导、诱导大众的意识行动朝自己所设想的政治目标发展的传播工作”^[2]。这说明政治传播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即通过传媒和宣传手段,形成某种政治氛围,改变民众的政治情感和价值取向,凝聚政治认同,使政治共同体成员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取得一致,并“使政治主体的政治心理框架符合政治体系中政治价值取向的要求”^[3],以达成更高的政治目标。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江苏省首次普选研究”(10ZZC007)、南京大学 985 改革型项目“中国政治选举研究”(NJU985JD09)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NJUB-1-4)的阶段性成果。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使党和政府获得了民众高度的信任,其威望和公信力大大提高。随后中国共产党适时地调整政策,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一化三改”。与经济上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相呼应,政治上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也成为必然。1953年开始的全国普选运动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也就紧密联系在一起,“选拥护总路线,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做代表”成为了普选中政治传播的核心目标。

普选开始之初,中央就对其明确定位,指出新中国第一次普选是一场伟大的政治运动,是进一步确立工人阶级领导,巩固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内部的民主运动。普选运动的性质决定了政治传播要围绕发扬民主作风,树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并紧密联系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而展开。根据中央的精神,江苏省选举委员会在政治传播中,明确要求:首先,让民众了解普选的意义,选举法的精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在民众中树立国家主人翁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从而为整个选举工作的进行,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其次,在政治认识提高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向民众宣传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使干部和群众懂得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谁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问题,认识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性质和选举权利的关系,以及选举权利的庄严性。再次,围绕候选人提名,深入说明人民代表与群众的关系,发扬民主精神,改善干部作风,密切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最后,最大限度发动民众参加选举,履行自己的选举权利,切身体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根本的政治制度。

显然,普选是一场人民内部的民主政治运动,它不同于土改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选举中要求除了对破坏选举的违法行为进行依法处理,以及对选举过程中所产生的人民内部的落后思想进行教育外,反对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发动群众,而主要依靠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通过对选举法意义的宣扬、选举制度和选举政策的传播、选举信息的传递,彰显党的选举文化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激发民众参与选举的热情,增强他们对新政权的拥护和新制度的认同,

以实现党建设新社会的政治理想。

二、基层选举与政治传播方式

1. 依托选举委员会,进行组织传播

组织是政治传播的保证。组织传播指的是一个组织使用其特有的组织媒体工具和传播措施的总和^[4]。其目的是形成组织氛围,凝聚组织力量,形成组织影响,促进组织内部、组织之间和组织外部的良性互动。它是一种有领导、有一定规模的信息传播活动^[5]。对于一个阶级和政党来说,进行组织传播是以一定的政治权力为基础和后盾的,因此,相对于其他政治传播方式,组织传播更为有效可靠,更有制度保证。强调组织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各项建设中一以贯之的原则。作为一场全国范围的涉及几亿人选举权利的普选运动,更需要核心领导部门充分发挥组织作用,通过组织渠道对普选方针和政策进行传播、宣传和贯彻,调动各级机关、各人民团体和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根据1953年《选举法》第35条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事宜由地方各级选举委员会负责。中央选举委员会在《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中也特别强调:“各级选举委员会必须把指导基层单位的选举,作为全部选举工作的重点”,“订出精确的计划,作好充分的准备,才能保证其顺利进行与如期完成”^[6]。根据中央的精神,1953年4月,江苏省基层普选工作开始启动,随后省、市、县、区、乡各级选举委员会相继成立。在基层选举中,各级选举委员会不仅是基层选举的领导机构,而且是组织传播的主体,它们将中央关于普选的决议、指示和目标等信息传递到城市社区和农村自然村落。一方面使选举信息自上而下得到有效传播,从而保持组织上下之间沟通和合作,另一方面通过选举信息横向的传递,保持组织内部之间以及同级组织之间横向联系和协调动作。具体传播的路径是:首先由各级选举委员会选拔、培训选举干部,在组织内传达普选精神,宣讲普选政策和内容,随后组建工作组,进入城市社区或村社,联络、发动基层党的报告员、宣传员和乡村干部,以及工会、妇联、青联、工商联和居民委员会、互助组等外围组织的积极分子,向他们传递上级组织有关选举的指示、计划和步骤等信息,然后再将他们建组成一支高效的、有规模的、有声势的选举宣传队伍,将选举的声音传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如南京市选举委员会培训了1970多名基层选

举领导干部,组成工作组下到街道、工厂、居民住宅区,与基层干部、居民宣传队员,分工包干,深入各家各户进行选举动员^[7]。南汇县选举委员会组建的普选工作组到监仓乡后,将乡村干部和44个党的宣传员、231个群众宣传员组织起来,分批训练,然后以互助组为单位,划片包干,分工负责,进行选举宣传^[8]。在江苏省基层选举过程中,各级选举委员会为农村基层选举共组织、训练普选领导干部29151人,技术干部68058人;为城市基层选举共培训普选领导干部2650人,技术干部6564人^[9]。通过组织传播,不仅对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一次普遍深入的民主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而且使广大人民群众懂得了实行普选和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建设的意义及与自己的切身关系,明白了选举的办法及其基本精神,积极参加选举,从而保证了全省基层选举有序开展。

2. 召开各级选举会议,构建场际传播网

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各项政治运动中最常采用、也是最主要的政治传播方式。会议一般都有明确的政治议题,具体的政治任务以及要达到的政治目标。会议发言者享有权威话语权,传达上级指示,交代政策界线,部署具体工作,因此,较之其他口头传达,会议传播更有权威性。在江苏整个基层选举中,会议传播在选举动员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传播路径自上而下,表现为垂直式,即召开省选举委员会→市、县选举委员会→区、乡选举委员会→选民小组四级选举会议,从而构建了一个紧密的场际传播网。

1953年4月,江苏省选举委员会成立后,召开了各市、县选举委员会主席联席会议,传达了《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讨论基层选举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对基层选举典型试办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省选举委员会召开了五次全体委员会议,四次农村、城市普选工作会议,检查了全省普选工作,交流了各地基层选举典型试办工作的经验。

然后市、县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统一集训区、乡干部和积极分子,市、县选举委员会主席和相关领导分别作报告和发言,宣讲普选的意义和性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好处,强调搞好普选工作的重要性,进行选举动员。参加集训的区、乡干部和积极分子集中听讲,认真学习普选文件,领会选举法的精神,理解选举法的内容,为指导基层选举作准备。

区、乡干部回到基层后,以党、团员为骨干,召开支部大会和扩大干部会议(包括工会、妇联、青联、居

民委员会等组织的积极分子、互助组组长、教师等等)会上除了传达上级会议精神外,主要讲解普选的具体步骤、普选宣传的具体内容和方法。

最后由党、团员骨干和积极分子组成选民小组,通过召开座谈会、漫谈会、黄昏会、乘凉会等形式,分区分片,挨家挨户进行宣传。让群众了解为什么要进行选举,懂得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谁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认识国家政权的性质和选举权利的关系,以及选举权利的庄严性,从而在民众中树立国家主人翁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

如南京市郊区陵园等四个选区的选民小组成员先后作了1555次报告,受到普选教育的群众近6万人^[10]。兴化县李健区严家乡作为普选典型试办点,乡选举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召开了全乡党员、团员、宣传员、乡村干部和互助组组长联席会议,会上重点宣传了普选的意义、精神和目的,强调所有干部要在进一步领导群众搞好生产救灾工作中,改进干部工作作风,迎接普选^[11]。在整个基层选举中,会议传播由上而下,由里而外,层层传达,不仅保证了选举信息的畅通和扩散,而且使每一个人都笼罩在选举信息传播网里,都能听到来自党和政府的声音。

3. 充分利用大众媒体,传递选举信息

报纸是大众传媒中最主要的载体,也是政治信息的重要传递手段。在电视尚未普及之初,报纸以其较快的传播速度、庞大的信息量,对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带有倾向性的报道,向人们传递着有关政治理想、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等政治知识与信息,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情感,引导和控制舆论的焦点和走向。马克思曾经说过:“报刊最适当的使命就是向公众介绍当前形势,研究变革的条件,讨论改良的方法,形成舆论,给共同意志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12]

在延安时期,党对报纸的政治传播功能就非常重视,1942年9月22日的《解放日报》社论明确指出:“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个巨大集体的喉舌”。新中国建立后,报纸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在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个人与党和国家的政策取向保持高度一致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江苏基层普选运动中,《新华日报》也不例外。从5月下旬开始,《新华日报》紧密配合江苏省的普选工作,陆续报道了全省关于普选工作的部署和各项准备工作;随着全省基层选举典型试办工作的开展,报纸在六月份着重报道了试办地区如兴化县严家乡、句容县城东乡、江宁

县河北乡、松江县洞泾乡等地选举情况和经验,七月份以后,该报除大力反映上述试办地区经过普选出现的新气象外,并通过社论、专栏、典型宣传、读者来信、普选讲话、短评、新闻综述等形式,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普选、人口登记、选民登记、选举权、选民证、候选人资格等选举知识进行通俗浅显的解释,对基层选举的进程、规模、声势和成果进行全方位报道,并大量登载基层选举的经验供各地交流。如发表了《加强领导 稳步前进,切实做好第一批基层选举工作》、《大力开展普选宣传工作》等社论,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我国的国家制度是人民代表制度》、《中国人民民主制度的新阶段》等,开设了“紧密结合生产,充分做好基层选举的准备工作”、“贯彻选举法,开展普选工作”等专栏,树立了“积极改变作风的人民代表陆福根”这样的典型人物,报道了《南京一桃园选区是怎样发动妇女参加普选的?》、《丽新纱厂选区的选举大会》、《一个“水上选区”的选民登记日》等基层选举的情况,刊载了《江宁县河北乡结合生产试办选举的初步成绩和缺点》、《无锡县紧密结合生产进行试办工作的做法》等文章。这些宣传和报道紧紧抓住普选的意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选举权利的庄严性、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普选与生产的关系等关键问题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突出意识形态特色之外,兼具群众性和生活性。

除报纸外,在当时广大农村,更多是采用土广播、屋顶广播、黑板报等媒介传递选举内容和信息。如铜山县七区杨屯乡选举委员会布置各村宣传员利用农民晚上乘凉时间,在村上地势高的地方采用话筒广播,每次宣讲一个中心内容,解决一个问题。句容县下蜀镇普选宣传员在晚饭后群众休息的地方进行土广播宣传,组织群众座谈,使镇上80%的选民都受到了普选的教育^[13]。武进县小河区东麓乡各学校与乡选举委员会联系,组织了“黑板报委员会”,宣传普选,教育和发动群众积极参加选举^[14]。尽管这些媒介形式存在传播面不广,受众组织性、纪律性不强等缺陷,但对文化水平不高,且处于春耕、农忙时节的广大农民来说,却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传播方式,群众反映:“这个办法比开会作用大得多,不耽误生产,“从土广播里照样能够听懂普选的道理”^[15]。通过以上多种媒介的传播,不仅使民众理解了普选的方针、政策和目标,热烈地投入到普选中,而且使党的选举文化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和认同,

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政治情感。

4. 发挥口号优势,贯彻普选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
口号是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政治口号常常通过简洁有力的字句,吸引广大民众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政治情感,影响其政治心理,以实现传播主体的政治目标。因其易懂、易记、易传播等优点在中外政治实践中被广泛运用,成为政治传播的一种非常重要方式。

在中国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相当重视口号的宣传,刘少奇就曾指出:“在群众一切争斗中,口号的作用极大。”^[16]这是因为当时党的群众基础大多是贫苦百姓,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所以朗朗上口、形象生动的口号群众更易理解和记忆,而且与报纸、书籍等传播媒介相比,口号经济成本低,不受时空的限制,随时都可派上用场。新中国建设时期,口号更是一个时代的符号,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在江苏普选运动中,各级组织就充分利用了政治口号这种极具宣传鼓动力的传播形式,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政权建设。在众多口号中,强调搞好生产与普选关系的口号占了极大的分量,这与基层选举的中心任务是相一致的。因为普选之初,部分干部和群众担心普选运动会影响生产,耽误农时。干部不敢组织积极分子学习,群众对普选表现较冷淡。针对干部群众的顾虑,各级选举委员会、普选工作组和基层干部始终贯彻普选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这在选举口号中得到很好体现,如“多打粮食,迎接普选”、“争取丰收,迎接普选”、“搞好普选,好好当家,发展生产,建设国家”、“选好种,长好苗,选了好代表,生产领导好”;“种子年年种,产量节节高,代表选得好,生产搞得好”、“搞好春耕增产节约,互助合作运动,迎接普选”、“降低次布率,消灭事故,迎接普选”、“巩固劳动纪律,加强工人团结,努力搞好生产,迎接普选”。另外还有“搞好教学,迎接普选”、“整顿作风,迎接普选”、“选好代表,巩固民主政权”等等。普选口号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南京机床厂的“普选献礼台”在一星期内就贴上科、室、车间、工段、小组及个人作为献礼的保证书共136份^[17]。江宁县东山镇14名人民代表带头出卖余粮10100斤,从而形成了群众出卖余粮,支援国家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热潮^[18]。这些简洁明快的选举口号在唤起民众当家做主豪情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为建国初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动力源。

三、基层选举的政治传播功效

1. 实现了普选的目标, 增强了民众对新制度的认同

在新中国第一次基层普选中, 江苏省各级选举委员会通过多种政治传播渠道, 拓展传播的广度, 加大传播的强度, 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统购统销工作和普选结合起来, 经过宣传动员, 广大民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 理解了实行普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实现总路线的有力保证, 使政治传播的目标——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和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拥护——得以实现。一些群众说: “听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言, 跟共产党走条条大道。”各地群众在代表候选人提名时, 都提出“选拥护总路线, 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做代表”。武进县永济乡在代表候选人提名时, 群众说: “普选就是发动群众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选出社会主义的带头人建设社会主义。”^[19]江宁县东山镇大街村的张发友对乡人民代表孙遇富说: “选县人民代表可是个大事情, 你要看准, 选那能带咱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 社会主义社会的好日子早一天到来。”该镇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刘天有当选县人民代表后, 农民们说: “选天有好, 搞互助组、办合作社他都走在前头, 选这样的人当县人民代表, 笃定能带我们走社会主义的路。”^[20]华东农业劳动模范李玉、全省农业劳动模范、江浦公子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周德春、沭阳县劳动模范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王大镛等都当选人大代表。选民们高兴地说: “有了共产党的领导, 又有这样好的代表参加管理国家大事, 社会主义建设可牢靠啦。”^[21]

2. 扩大了民众的政治参与

民主选举是现代民主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民众参与国家事务的重要途径。江苏基层普选运动中广泛而深入的政治传播, 使民众理解了普选的意义, 认识到选举权的重要性, 对政治参与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如南京市的教师、学生以及科学技术人员积极、主动地投入普选运动中, 许多教师认真学习和讨论选举法的民主精神, 参加选举工作会议; 青年学生主动参加地区普选宣传和临时托儿站的工作; 有的少先队员替居民画普选宣传画, 感动了附近的居民也参与普选中。无锡市丽新纱厂在举行选举大会时, 很多在家休养的职工都乘车赶来参加投票, 还有的特别从上海、苏州赶来, 参加选举的人占全体选民的 98.83%^[22], 群众参政热情可见一斑。此外, 在

普选宣传中特别强调男女选举权利的平等, 广大妇女感动地说: “共产党带来了民主”, “毛主席给我们选举权”^[23]。“我们不光是家庭主妇, 还是国家的主人, 要拿出当家做主人的样子”^[24], 从而积极投入普选运动中。至 1954 年 4 月江苏省基层选举结束时, 69 个县共有选民 17331664 人参加了投票, 占选民总数 21181375 人的 81.83%, 其中妇女选民参加投票的有 9470343 人, 占妇女选民总数 11748984 人的 80.6%^[25]; 12 个市共有 1897884 人参加投票, 占选民总数的 90.1%, 妇女选民参加投票的有 871218 人, 达到妇女选民总数 969548 人的 89.8%^[26]。

3. 推动了新的政治文化社会化的进程

阿尔蒙德、鲍威尔认为: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每个政治体系都有某些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 它们影响政治态度, 灌输政治价值观念, 把政治技能传播给公民和精英人物。”^[27]一方面, 它是政治体系通过一定的渠道将政治文化传播给社会成员, 影响民众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观, 以使广大社会成员的行为符合现行的社会和政治规范的过程。另一方面, 它又是社会个体通过教育和其他途径, 学习政治知识和技能, 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和心理, 将自己塑造成合格政治人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实际上是同时进行的, 都是为了实现个体的政治社会化, 培养公民对主流政治文化的认同和支持。1949 年中国共产党虽然通过革命获得了政权, 但为了使执政的合法性符合民主的程序, 体现人民的意志, 遂进行了 1953 年的普选。中共的选举理念, 新政权的选举文化和选举制度无疑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也是政治传播的基本内容。在普选中, 各级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 培训选举干部, 组织积极分子集中学习, 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 我国选举制度的先进性, 批判资本主义选举制度的虚伪性, 同时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团体、大众传媒等传播途径, 向各界群众宣传选举政策, 解答选举过程中的疑问, 及时、大量地报道选举信息, 总结和推广选举经验, 从而使新政权的选举文化迅速社会化, 有力地推动了民众对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价值取向的认同和支持。

余 论

美国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指出: “卡尔·马克思认为控制生产手段就可以左右历史; 在我们这个时代, 控制了交流手段才能左右历史。”^[28]政治传播无疑

是最重要的交流手段,通过政治信息的输出和输入,引导和影响大众舆论,成为推动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软力量”。因此,要想变革社会,就不能不考虑政治传播。在政治传播过程中,不同的传播媒介、传播渠道影响的受众也是不同的。建国初期,由于大众传播媒介有限,民众文化水平不高,为了使选举制度、政策和信息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党和政府充分发挥各种传播渠道、多种媒介的合力优势,共同作用于民众。对一些文盲受众,更多是借助于土广播、口号或面对面的口头宣传等形式,对机关干部等群体,则通过会议传达、文件解读和报纸等渠道,进行政治传播,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政治传播凸显出高度的组织化和集中化,党成为政治传播体系的“神经中枢”,决定着利益表达、综合、决策、输出的全过程,各级选举委员会则担负执行、反馈、输入等功能。高密度的政治传播所产生的累积和引导效应,濡化了民众的政治心理,激发了他们的选举热情,并化作行动的力量,而这反过来又夯实了新政权的执政基础。同时新政权在普选运动中对政治传播的运用,折射出建国初期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与政治传播的密切关系,反映了政治传播在促进政治整合、达成社会共识方面的重要性。

当然,在民主建政的初期,基层选举的政治传播方式具有明显的高度动员特点,过分注重选举权的阶级性,追求高投票率,着力强调信息传播的统一性,从而使基层选举中的政治传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这与那一时期国内政治建设环境不无关系。

注释

[1][英]布莱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殷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2][日]竹内郁朗主编:《大众传播社会学》,张国良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页。

[3][5]邵培仁主编:《政治传播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第330页。

[4]胡河宁编著:《组织传播》,〔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6]《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北京〕《人民日报》1953年4月6日,第1版。

[7]《南京市城区普选试办区在人口调查选民登记中结合每个具体环节进行多种多样宣传》,〔南京〕《新华日报》1953年8月20日,第1版。

[8]李钧、钱林兴:《南汇县监仓乡的普选宣传工作》,〔南京〕《新华日报》1953年8月6日,第3版。

[9]江苏省选举委员会编:《江苏省城市基层选举工作总结》,《江苏省普选资料汇编》(下编),第184页,江苏省档案馆藏,全宗号3062,目录号3,案卷号0004。

[10]《南京、无锡、徐州等省辖市首批基层选举工作展开》,〔北京〕《人民日报》1953年9月23日,第1版。

[11]《兴化县严家乡以生产救灾为中心,结合进行普选试办工作》,〔南京〕《新华日报》1953年6月15日,第3版。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8页。

[13]《句容县城东乡、下蜀镇结合生产开展基层选举典型试办工作》,〔南京〕《新华日报》1953年5月23日,第3版。

[14]《读者来信》,〔南京〕《新华日报》1953年11月29日,第4版。

[15]《铜山县杨屯乡用土广播宣传普选群众非常欢迎》,〔南京〕《新华日报》1953年8月16日,第3版。

[16]《论口号的转变》,《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17]《全省四千多乡镇完成了基层选举》,〔南京〕《新华日报》1954年1月1日,第2版。

[18]江苏省选举委员会编:《关于江苏省选举工作情况的报告》,《江苏省普选资料汇编》(下编),第173页,江苏省档案馆藏,全宗号3062,目录号3,案卷号0004。

[19]《永济乡基层选举基本上做到既好又快》,〔南京〕《新华日报》1954年3月23日,第3版。

[20]《江宁县人民代表大会今日举行》,〔南京〕《新华日报》1954年3月25日,第4版。

[21]《全省第一批基层选举取得很大成绩》,〔南京〕《新华日报》1953年12月1日,第2版。

[22]方玉书:《丽新纱厂选区的选举大会》,〔南京〕《新华日报》1953年9月1日,第1版。

[23][26]江苏省选举委员会编:《江苏省城市基层选举工作总结》,《江苏省普选资料汇编》(下编),第185页,第184页,江苏省档案馆藏,全宗号3062,目录号3,案卷号0004。

[24]《南京市城区普选试办区在人口调查选民登记中,结合每个具体环节进行多种多样宣传》,〔南京〕《新华日报》1953年8月20日,第1版。

[25]江苏省选举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基层选举工作总结》,《江苏省普选资料汇编》(下编),第178页,江苏省档案馆藏,全宗号3062,目录号3,案卷号0004。

[27][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霏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版,第91页。

[28][美]西奥多·怀特著:《美国的自我探索》,〔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20页。

〔责任编辑:肖波〕